

#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侨易学”

张斌

与叶隽兄相识，是在社科院的党校，三个月同窗，还是同桌，课余海阔天空，虽是闲聊，但收获甚多。我的专业是财政学，且研究领域侧重制度与政策，好在曾经尝试着研究“税制的变迁”，对现代化进程中所谓“落后”国家的制度模仿及其相关的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也有所涉及。

拜读了叶隽兄的大作《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后，深受启发，尽管“隔行如隔山”，我的研究领域按此书的概念更多属于“度”（制度）和“器”（器物）的层面，与“道”（文化）相去甚远，本无资格和也无能力对“侨易学”发表什么评论，但看到书中所引费孝通先生之言：“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融会贯通，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深以为然。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侨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两个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因此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谈谈自己对“侨易学”粗浅的理解，希望对学科间的交流贡献点微薄的力量。

##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物质位移”

“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注时间维度的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按照“侨易学”所阐述的基本理念，其所研究的“侨易现象”是“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联合在一起的”，“侨易现象既非单纯的位移现象，也非纯粹的思想现象，而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结合”，而作者也强调：“脱离了具体的物质环境和制度层面的思想也是不可能的”。

不同文明体（文化子系统）之间通过不同程度的接触、融合导致不同程度和难以预料的相互影响的历程应当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这一历程中，即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式的基于个体的和精神层面的“物质位移”，也有西方传教士有组织的到全世界传播福音式的“物质位移”；即包括亚历山大帝国扩张、十字军东征、胡服骑射、五胡乱华等与战争、掠夺、征服相关的“物质位移”，也有丝绸之路性质的基于远程贸易的“物质位移”。

上述“物质位移”对不同文明体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即有纯精神层面的，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日本“大化革新”对当时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模仿；也有“器物”层面的，如玉米、烟草、辣椒在全球的广泛种植。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产生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内在的扩张本性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并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迫使不同文明体都要直接面对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这一时期的“物质位移”与前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承载或导致“物质位移”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包括“器物”层面的产品、技术、生产流程，也包括了与这些“器物”生产和贸易相关联的“制度”，如企业制度、管理规章。

如果将“物质位移”的主体仅局限在作为个体的“自然人”，那么引发这些自然人在不同文明体间移动的主要动力不再是纯精神层面或制度层面的诉求，而更多的是经济学语境下“人力资本”的流动。在这个意义上，“侨易学”研究的“侨易现象”就不仅包括“留学史”视角下的知识精英，还应包括西方跨国公司高级管理者到发展中国家对“东道国”管理者、工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精神层面”的影响，外来劳工和“移民史”视角下背井离乡的普通劳动者的“精神质变”以及这种变化对其“母国”的影响。

按照“侨易学”的概念，经济全球化下因“侨”而致“易”的过程就不仅包括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跨越不同文明体的地理位置上的物质位移，还应包括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下的“自然人”进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下的“物质位移”导致的“精神质变”。如农民工进入现代化生产车间后精神上的改变也应该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侨易现象”。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甚至这种“物质位移”可以是基于“虚拟空间”而非地理空间。想想在中国参加视频全球会议、工作语言是英语，

日常娱乐是泡吧和追美剧的白领们。

全球化首先改变的是生产方式、然后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在全球化的初期更多的是少数知识精英由“侨”而致“易”，并致力于将其“精神质变”嵌入到“母国”的传统社会中，那么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由国际分工链条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塑造出“他乡”，对很多人而言，“他乡”就是“故乡”，已经没有了“乡愁”。

##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精神质变”

经济全球化下“物质位移”的背后是国际分工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在经历了大航海时代、黑奴贸易、殖民主义、自由贸易、两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利益争夺）和冷战（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以及冷战结束后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后，越来越多的文明体被卷入相同的生产方式并被置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而不同文明体（或民族国家）和文明体中个体的物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完整链条的不同位置决定的。在经济学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利益相关联的“物质位移”会带来更强大和更持久的“精神质变”。

不同文明体中的个人（延伸至家族、文明体中个别国家）更容易受到强势文明的影响而改变，从而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获取不错的地位，但同时也产生了依附性和对原文明的疏离，典型的例证是前殖民地国家中由宗主国扶持起来的“精英阶层”和发展中国家中的“买办”和“代理人”阶层。

但是，在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依靠“坚船利炮”和“基督教”推行“武装殖民”和“自由贸易”的压力下，弱势文明体中的精英也会产生改造和对抗的冲动，这种冲动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展到通过剧烈的社会改造奠定工业化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和精神基础并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可能对强势文明产生反作用，但这种改造和冲动也包括现代化努力受挫后由绝望产生的极端保守主义。简单讲，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体自身的特

质、与强势文明（西方文明）的空间维度（所谓近东、中东、远东）、接触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等因素决定了不同文明体的现状（印第安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亚儒家文明）。

如果说孕育于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自身传统社会的改造产生了精神的质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的社会主义思潮），从而形成了现在的西方文明的话，那么其他文明体在面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承载，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时，其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时导致的整个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系统的“撕裂”、“混乱”，甚至“崩溃”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着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制度”和“器物”层面在非西方文明疆域内建立起“飞地”（如租界），并借由主动或被动的工业化进程逐步蚕食、改造传统经济社会时，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必然导致在一个文明体（民族国家）内产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群体，在伊斯兰世界是世俗派和保守派，在泰国是“黄衫军”和“红衫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非西方文明而言，其“精神质变”的历程与其工业化和经济国际化程度息息相关，而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文明体（民族国家），这种“精神分裂”最为严重。

当一个文明体（民族国家）的经济被人为分割成纳入国际分工的部分和未纳入国际分工的部分，或者被分割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这会导致不同群体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利益是相对独立的，由于不同群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背后依托的是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未达到经济共同体状态的民族国家其精神必然也是分裂的，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的根源是“利益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未达到经济共同体状态的国家中的社会各阶层由于缺乏共同的利益载体是难以通过“妥协”达成一致的。如乌克兰动乱和分裂的原因除了民族因素外，其东西部对纳入欧盟经济圈还是留在独联体经济圈存在不可弥合的矛盾也是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与接受了传统教育的知识精英通过“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的过程类似，经济全球化下一个非西方文明体（民族国家）不同群体不同程度的“物质位移”及其导致的“利益的分裂”是“精神质变”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势必要承受“精神分裂”的痛苦。

### 三、“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的互动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广义的“物质位移”更多的是现代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其核心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工业化。而如果将“物质位移”的视角从全球化转到工业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和“基督教”，非西方文明体（民族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接受或不主动引入现代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就面临着被殖民、自身文明衰落，甚至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如果接受或主动推行工业化就势必要改造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行“西化”，但“西化”后能否保持自身文明的特征和传承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不可遏制的扩张，民族国家间惨烈的竞争不可避免的倾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线性的历史发展观，所谓“天下大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不同的非西方文明体面对全球化和工业化（现代化），并非都实现了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质变”，许多文明体被彻底摧毁了，但也有非西方文明体（民族国家）成功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在“物质位移”的刺激下，不同的文明体是如何进行“精神质变”的，那些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质变”又是在特定文明体中产生和发展的，这些“精神质变”是怎样反作用于“制度”和“器物”层面，从而促进或推动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在非西方文明体中的扩张，这些问题是各人文和社会学科都应高度关注的。

相对于汤因比的“挑战-回应”框架，“侨易学”更多的强调“物质位移”导致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也就是说，“侨易学”关注的是各非西方文明体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时由“物质位移”导致的“精神质变”的具体过程，提醒我们深入到各文明体内部研究不同文明体的特质所导致的在“物质位移”情况下“精神质变”的差异及其影响。

就经济学而言，学者们最初关心的是相同的生产设备、相同的管理规程在不同国家生产效率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则着重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因；而近期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则关注导致个体行为差异背后的深层根源。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逐步放松“理性人”假设，转而探究受到

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的个体行为的差异及其制度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经济学与“侨易学”之间有更为广阔的交叉研究的空间。

## 四、“侨易学”的中国意义

《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结语部分专门有一节论述“侨易学”的中国意义，提出“中国人也应当在全球化的时代寻到属于自己的东方位置”。近代以来，中国在东西方交流或者说全球化进程中始终是一个追赶者或者接受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交流以及因“侨”致“易”是单向的。实际上，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传播几乎都是单向的，很少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实质性影响。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作为 GDP 第二的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势必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所谓的“中国道路”颇多疑虑。但至少应当承认，与 1840 年、1911 年、1949 年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特质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暂且抛开那些“先验”的、“规范”意义上的评价标准，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文明，我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精神质变”，这些“精神质变”与“物质位移”的关系是什么，由于中华文明的哪些特征导致了相同或相似的“物质位移”引发了可能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精神质变”，这些“精神质变”又是怎样作用于中国以赶超为目标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并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关系的？而面对我们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这些“精神质变”的缺陷是什么，又产生了怎样的危害？

面向未来，如果说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生产方式的分割必然产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混乱和“精神分裂”的话，那么就中国而言，现在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后期，应当具备孕育和产生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条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精神质变”，从而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如果中国下一步的“精神质变”能够为人类文明的

进步提供一些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质，人类历史中的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全球化视角下看待“侨易学”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无疑是令人振奋的，祝愿“侨易学”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中茁壮成长。